

〔瑞士〕杜伦马特著

抛锚

—

是不是还有什么可写的故事留给作者们来写呢？假定一个人不愿意放浪不羁地谈谈他的自我，觉得没有必要坦率地去讨论他个人的雄心或是描绘他的性生活；假定他宁愿明哲保身，对自己的私生活保持适当的缄默，他心满意足地干自己的事儿，就像一位雕刻家专心刻他的石头，尽管他时常白费气力，却总还是采取一种孤高的超然态度。要是他抱定这个想法，那么一个作家的工作就会更加困难，更加凄凉了；它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种孤寂的、索然寡味的活动了。那么文学上的荣誉本身又有什么用处呢？有多少作家还没有获得这种荣誉——有哪些拙劣的作品没有得过奖呢？

或者假定一个作家打算写写现代的场面，他就几乎没法

摆脱进退两难的窘境了，因为电影和报纸提供了更世俗的消遣，凡是比低级趣味的报纸稍微高明一点的又都要求“深度”读者也只肯花钱去买那些被认为有“更深刻的意义”东西：道德方面的教训、精辟的言论、对过去或现在的某种信仰的否定或肯定。总之，他们需要的是“文学”。

但是假定这个作家坚决不写这一类事儿，他深信他的艺术的根基主要地是个人的，而且完全是他自己的事——那又怎么办呢？要是他相信创作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愿意跟评论或批评纠缠不清，又怎么办呢？他一旦这样想，就只有断然搁笔了；他没法避免。他不得不这么揣测：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他这一辈子没有当艺术家的希望了。他最好不干这一行。

当然，偶尔写那么三言两语的也许还有可能；不过除此以外，一个作家给与读者的只能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人类未来的推测，或者对宇宙之谜中的条理与和谐的某种解释。其余的说来说去不过是王公大人、政治家、电影明星和百万富翁们的所作所为罢了——反正都是那么回事，读者看了一眼马上就不要再看了，因此这一切都是属于报纸副刊和带插图的周报的，并不属于艺术。

跟这一切相对照的是个人的日常生活：我要谈到的是西欧人的（确切地说，瑞士人的）生活，一种平凡的生活，它受到天气的变化和证券交易所行情涨落的影响，为一些不打紧的艰难困苦和往往在个人成败关头发生的情感上的波动所烦扰；可是这种生活好像没有什么世界性或宇宙性的意义。命运之神已被赶出了展开这样的场面的舞台，正在边厢里焦急地待着——置身于叫那些主要角色遭受不幸、疾病和灾难的

现代的生活概念之外，甚至像战争这么重大的问题，现在也全靠电脑能不能正确地预测来决定，而失败的可能性不过是数学上的偶然误差罢了。这本来只是一种计算的错误；并不像由于一个螺丝钉松了，一道线圈散了，一件控制机械失灵了，而我们的全部文明就会为电流的短路或走火所毁灭，叫人想起来就那么担忧。

我们不再敬畏上帝，不再担心公道和正义的惩罚以及《第五交响曲》^①中不断出现的命运了。可是我们还有车祸 由于建筑不牢固而造成的决堤，由于技术人员的疏忽、没有把机器关好而引起的原子工厂的爆炸。我们忙忙碌碌的、商业化的生活中时常令人惴惴不安的只是害怕机器发生故障；唯有那些纪念过去的牺牲者的小小墓碑，才使我们想起命运。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两个可写的故事了。在这一两个故事里，还可能从一张普普通通的脸上偶尔发现人类的本性；一场微不足道的灾难会意外地触及普遍的真理；公道，正义，甚至美德，还可以一刹那间从一个醉醺醺的老头儿的单眼镜里看个清清楚楚。

二

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虽说是一件小事：仅仅是汽车抛锚。做纺织生意的阿尔弗利多·特雷普斯 四十五岁 还有一点没有发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可是这一切多少总显出受过正规的训练，因此骨子里流露出某种隐藏着的生硬的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的《命运交响曲》。

因素——一个推销员。我们的这位同胞刚刚驾着他的斯托得倍克牌汽车，在我们的一条大公路上飞驰着；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赶回他家所在的那个相当大的城市，不料这时候他的车子没有汽油了。简直开不动。毫无办法，那辆光闪闪的红色汽车只好停在公路蜿蜒穿过的一座小山冈脚下。天空的北边已聚起了霏霏的云堆，西边的太阳还高挂着，放射出午后的余晖。特雷普斯抽了一支烟，然后去打了个电话。修汽车的人终于来了，准备把那辆斯托得倍克拖走，不过他说要到明天早上才能修理好；输油管出了点毛病。这是不是实话，可没法弄清楚，而且最好也不必去弄清楚：我们只得听任修汽车的人的摆布，恰像我们曾经遭受拦路强盗的抢劫，或在更早的时代落在当地的凶神恶煞手里一样。特雷普斯懒得花上半个钟头走到最近的火车站，坐那便捷的、可是相当嘈杂的火车返家，回到他的妻和四个孩子（都是男孩）那里去，他决定就在这儿过夜。这时候是下午六点钟——热烘烘的，一年里白天最长的日子还没过去。

汽车修理站在一个村庄外面。这村庄是个好所在，房屋零零落落地展延到一群树木繁茂的山冈，村子中央有座小山丘，山丘顶上矗立着教堂、牧师住宅和一株有铁栏围着、用支柱撑着的古老橡树。处处整齐、干净；甚至农舍前面的粪堆也搁得井井有条，砌得端端正正。还有一座小工厂、几家酒店和乡村客栈。有一家客栈是特雷普斯时常听人称道的，可是房间都住满了——那里正在举行饲养家禽的农民的集会——于是特雷普斯被引到一家间或也接待没地方住的旅客的、宽敞的私人住宅里去。

特雷普斯踌躇了一下。还来得及坐火车回家，可是他又

巴望着可能有一次艳遇。有时候，乡村里有些姑娘们——像最近在格罗斯俾斯特林根的情形一样——他们会看中一个纺织业的推销员的。他又打起精神，朝那所房子走去。教堂里的钟声当当地响了。牛群哞哞地叫着，回到它们的牛栏里去。

那所房子座落在一个相当大的花园里。这是一所三层楼房，平顶，白晃晃的墙壁，绿色的百叶窗。房子一半被一些灌木、修剪过的山毛榉和常绿树遮掩住。临街的一面有些花，大多是玫瑰，花丛中有一个系着皮围裙的小老头——可能就是房子的主人——正在修剪花枝。

特雷普斯上前打了个招呼，请求借宿。

“你是干什么的？”老头儿问道。他走近花园的门，抽着雪茄，他的个儿比园门几乎高不了多少。

“我是做纺织生意的。”

老头儿跟一般远视眼的人一样，从没边的小眼镜上面盯着特雷普斯，把他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好的，当然可以啦，你就在这儿过夜吧。”

特雷普斯问要付多少房钱。

老头儿回答说，他向例是不收费的。他一个人在家，儿子到美国去了。他有个女管家，西蒙小姐，经常照顾他，他很高兴不时有客人来往。

推销员向老头儿道谢，表示承蒙接待十分感动，并且说，他看到乡村里那种古老的好客之风显然还没有消失，感到很愉快。

花园的门为他敞开了。

特雷普斯向四下里瞧了瞧。砂石铺的小路，草坪，一大片覆着树荫的地面到处洒落着斑斑点点的阳光……

他们走到玫瑰花跟前的时候，老头儿说今晚上还有几位客人来。他小心翼翼地在一丛玫瑰花上修剪了一下。他接着说，晚上要来的是住在附近的几个朋友，其中两个住在村子里，另一个远一点，靠近山冈。他们跟他一样都年老退休了，由于此地气候温和，没有燥热的南风，才搬到这儿来住的。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鳏夫，很想知道些新鲜、有趣和令人兴奋的事儿；因此，要是特雷普斯先生愿意跟他们一道吃顿饭，一同消度这个夜晚，他是非常高兴的。

这位推销员起初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他本来打算在村子里，在那家出名的客栈里吃饭。可是他又不便谢绝老头儿的盛意。他觉得非答应不可——归根到底，人家让他借宿，还不用花钱。他不愿意当那种典型的不懂礼貌的市井之徒。于是他装出一副满心欢喜的样子。

主人把他引到二楼上去。

房间很雅致，有自来水，一张宽床，桌子，安乐椅，墙上挂着一幅霍德勒^①的画，书橱里摆着皮面精装的古籍。特雷普斯打开他的手提包，洗过脸，刮了胡子，在身上洒了些科隆香水，然后走到窗前，点燃一支香烟。

大金盘似的太阳正在悄悄地朝山冈那边滑下去，把那些山毛榉照耀得闪闪发亮。

他把当天的事儿匆匆地重温了一遍。罗歇公司的订货——还不错。跟威尔霍尔兹的争执——那家伙要求九五扣；老实说，真恨不得把他的脖子给扭断了。接着往事一桩桩地在眼前浮起。乱七八糟的日常琐事。预先计划好的在托林大旅

霍德勒（1858—1918），瑞士画家。

社找个女人。是不是要给他最小的男孩（他最宠爱的孩子）买一套小电动火车的问题。又想到他真该给妻子打个电话，让她知道他回不了家的缘故……不过他也用不着发愁；那是照例的谎话——她都听腻了，反正不会相信他的。

他打了个哈欠，又点燃一支烟。打窗口朝外边望去。他瞧见三位老年人大踏步地走上砂石铺的小路，走在前面的两个，臂膀挽着臂膀，第三个是个胖胖的秃顶老头，落在后面。一遍一遍的问候、握手、拥抱，谈论玫瑰花。

特雷普斯从窗前走开，瞧瞧书橱。从那些书名看来，他得捱过一个枯燥无味的夜晚了。霍岑多夫的《杀人与死刑》；萨文伊的《现代罗马法体系》恩斯特·大卫·荷雷的《审讯实务》等等……

推销员理会到今晚上的情形不妙。他的主人是当过律师的。谈话准会是一连串冗长乏味的讲演。这些受过教育的先生们对于现实生活究竟懂得多少呢？什么也不懂。不幸还有一种可能：谈锋也许会转到艺术之类的问题上去，那么他就会闹出点儿笑话来。唉，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要是他不必要常常为生存竞争而挣扎，要是他不去做生意，他也能跟他们一样懂得许多高雅的玩意儿。

他兴致不那么高地走下楼去。老头儿们都已安坐在夕阳斜照着的露天走廊上，那个身体健壮的女管家正在隔壁的餐室里安排餐具。

当他比较接近地看清了这群客人的时候，简直大吃一惊。幸好他的主人走上前来迎接他，给了他一个镇定下来的机会。

房子的主人现在打扮得差不多像个花花公子似的。他那稀疏的头发刷得光溜溜的，可是他那件大礼服却肥大得很不

合身。他发表了一篇短短的演说来欢迎特雷普斯，话语中给推销员暗示着下一步他该怎么办。

特雷普斯含含糊糊地说，躬逢盛会十会高兴。他淡漠地、傲然地鞠了个躬，摆出老于世故的商人的架子——虽然他刚才还在默默地冥想着，自己在这个村庄里停留，原来不过是想找个女孩子开开心，现在却根本办不到了。

他发觉他又碰到了三个跟年迈的主人同样刁钻古怪的老怪物。就像几只巨大的乌鸦，他们那穿上黑衣裳的身影，挤满了摆着几把柳条椅子、挂着遮阴凉篷的、夏天的走廊。他随即注意到，那几个老头儿的大礼服都是最讲究的，可是他们却老态龙钟、邋里邋遢——只除了那个秃顶老头（名叫皮勒特，七十七岁，这是主人现在开始互相介绍的时候告诉特雷普斯的），他昂然不动地端坐在一张极不舒适的凳子上，虽然旁边有几张空着的安乐椅他也不坐。要说呢，皮勒特先生不过是装出一副格外有礼貌的样子罢了，他的衣服扣眼里插了一朵白色的石竹花，还不住地捻着他那染黑了的浓密的小胡子——他显然是领了养老金退休的，也许从前当过教堂里的杂役或是扫烟囱的人，后来走了好运，也许甚至从前是个火车司机。另外两个老人比起他来就显得邋遢得多。其中一位（库默先生，八十二岁）甚至比皮勒特还要胖——简直臃肿不堪。他看来就像是用一些油腻腻的香肠拼凑起来的。他坐在一张摇椅里，红通通的脸上挺起一只鼓鼓的酒精鼻子，金边夹鼻眼镜后面突出一双睁得溜圆的大眼睛。他的黑色礼服里面穿了一件睡衣——或许是他忘了把它脱下来——外衣口袋里还插着报纸。另一位（佐恩先生，八十六岁）身体瘦削，形容枯槁，左眼上夹着一个单眼镜，脸上有决斗时留下

的疤痕，鹰钩鼻子，瘪嘴巴，雪白的、乱蓬蓬的头发；不折不扣地是个老古董；背心扣子也扣歪了，脚上穿的短袜一样一只。

“喝杯酒吗？”主人问。

“好，谢谢。”特雷普斯回答道，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那个枯瘦的老头从单眼镜底下很感兴趣地膘了他一眼，问道：“我相信特雷普斯先生会参加我们的游戏吧？”

“唔，当然啦。我素来是喜欢游戏的。”

老头儿们微笑了，直晃着脑袋。

“我们的游戏可能有点儿稀奇，”主人慎重地说道，“这些个晚上我们玩的是重操旧业的游戏。”

客人们又颇有礼貌地、会心地微笑了。

特雷普斯给弄得莫名其妙。那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是当过法官的，”主人解释道，“佐恩先生从前是个检察官，库默先生是辩护律师。我们玩的是开庭审判的游戏。”

“哦，我明白了。”特雷普斯说。他觉得这个主意不坏。也许今儿晚上总算没有白白浪费掉。

主人一本正经地紧瞅着他，用亲切的语调向他解释，他们通常是重演一些著名的历史上的审判案：例如苏格拉底的

审判，耶稣的审判^②，圣女贞德的审判^③，德莱弗斯的审判。最后他们进行过德国议会纵火案的审判。有一次他们还发现菲德烈大帝^④ *non compos mentis*^⑤。

特雷普斯听得心荡神驰。“你们每天晚上来这种玩意儿吗？”他问。

法官点点头。他接着说，不过，当然啦，要是他们能运用眼前的材料来演习，那就更有兴味了，因为眼前的材料往往会演变出特别热烈紧张的场面。比方说，就在前天晚上，他们审问了一位刚在村子里发表过竞选演说而没有赶上最后一班火车的政治家。由于敲诈和受贿，他被判处了十四年徒刑。

“你们这个法庭倒真严厉呀。”特雷普斯逗趣地说。

“我们是依法行事。”老头儿们眉飞色舞了。

于是特雷普斯就问，他在这个游戏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更多的笑声，几乎是轰然大笑。

主人指出，他们已经有了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这些总归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懂得游戏规则的职业。只有被告

① 苏格拉底 公元前 469—公元前 399 是古希腊唯心主义的大哲学家，曾被奴隶主民主派控以不敬传统神明、败坏青年、反对民主之罪，由法庭判处死刑，服毒而死。

② 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生于犹太之伯利恒，召十二门徒，传教于巴勒斯坦等地，后遭犹太教当权者的仇视，被拘送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判处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

③ 圣女贞德（1412—1431）是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法国女英雄，曾于 1429 年率领法军抗击英军，解奥连斯城之围，后来不幸为英军所俘，被焚死。

④ 德莱弗斯（1859—1935）是法国炮兵军官。1894 年因受诬告，以泄露军事秘密的罪名被撤职，曾一再受审，直至 1914 年始最后宣判无罪。

⑤ 1933 年 2 月，希特勒制造议会纵火事件，企图借此禁止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因季米特洛夫等坚持斗争，揭穿了法西斯的阴谋。

⑥ 菲德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 在位。

⑦ 拉丁文，意为：不辨是非。

的位置还空着。不过除非特雷普斯先生自己愿意，并不勉强他参加这个游戏，这一点希望能得到充分的谅解。

这个主意正好投合推销员的心意。这一晚不会白白度过——决不会像他开头所担心的那么高雅和枯燥，可能倒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特雷普斯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智力并不怎么强，也不大善于思考：一个生意人，用得着聪明的时候他相当聪明，在他本行的业务上只要能抓得着的就决不放松，可是也爱好佳肴美酒，喜欢开开心心的、实际的玩笑。他说，他很高兴参加游戏，要是让他充任被告的角色，将感到十分荣幸。

“好啊！”检察官拍着手哇哇地叫道，“好啊，有人答应了。我敢说这是有胆量。”

特雷普斯好奇地问，那么他犯的该是什么罪呢。

“完全是次要的问题，”检察官回答道，擦擦他的单眼镜，“罪名总归是可以找到的。”

大家都笑起来了。

库默先生站了起来。“来吧，特雷普斯先生，”他差不多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我们得品尝品尝主人拿来待客的红葡萄酒。这种酒真是妙极了，不可不尝尝。”他把特雷普斯带到餐室里去。

一张大圆桌端端正正地摆在餐室里。椅子都是高背的，墙上挂着几幅色彩阴暗的画：一切摆设都是结实的、旧式的。走廊上传来老头儿们噙噙喳喳的谈话声；夕阳的残照从敞开的窗子里闪进来；鸟儿在窗外啁啾地鸣啾。一张小些的桌子上摆着一排酒瓶，炉台上还有更多的瓶子，波尔多红葡萄酒一篮篮地装着。

辩护律师拿起一瓶陈年的红葡萄酒，小心翼翼地倒着，两只手稍微有些颤抖。他斟满了两小杯酒，然后跟推销员碰杯——可是碰得很谨慎，盛着名贵的酒的那两只杯子几乎只是轻轻地接触了一下。

特雷普斯尝了一口，味道的确不错。他说：“好极了。”

“特雷普斯先生 我是你的辩护律师，”库默先生说，“因此让咱们俩为亲密的友谊干杯！”

“为亲密的友谊干杯！”

最好是——律师一边说，一边把他那挺着酒糟鼻子、挂着夹鼻眼镜的红通通的脸更凑近特雷普斯，以致他的便便大腹 那松软、难看的肉堆 简直碰到我们的朋友身上去了——最好是特雷普斯先生马上把自己犯的罪跟他讲明了。只要特雷普斯肯这么做，库默先生可以保证他安安稳稳地通过这场审问。当然 情况并不严重，可是重重的难关也不可轻视。那位形容枯槁的检察官智力倒还是很强的，他当然是个得小心对付的人物。至于那位法官，他们的主人，不幸一向是执法如山的，甚至可能还喜欢装腔作势——他这些脾气愈老愈刁：这老头儿究竟是八十七岁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这个当辩护律师的却顺利地挽救了大多数他的诉讼委托人，或者至少不让他们陷入最糟糕的境地；事实上，只有一件案子——一件抢劫兼杀人案——他毫无办法挽救他的诉讼委托人，不过他猜想，抢劫行凶总该不会是特雷普斯先生的拿手好戏吧？

特雷普斯笑了。他说，不幸得很，他什么罪也没犯过。

“为你的健康干杯！”

“最好是坦白地跟我说，”他的辩护律师鼓励他，“你用不着害臊。我懂得生活；决不会再大惊小怪的。我经历过多多

少人世坎坷，特雷普斯先生，我也面临过令人战战兢兢的深渊——我敢对你这么说！”

“很抱歉，”特雷普斯笑嘻嘻地说，“真是非常抱歉。可巧我这个人，就是个没犯过罪的被告。反正侦查罪名是检察官的事儿——他自己这么说过的，那么咱们就老实相信他的话吧。游戏总归是游戏嘛。”

特雷普斯接着说，他很想知道究竟怎么个玩法。是不是真的要进行审问呢？

“我想是这么的！”

“那就等着瞧吧。”

辩护律师显得很严肃的神色。

“特雷普斯先生，你以为你自己是没有罪的吗？”

推销员又笑起来了。“的确这样。”他认为这事儿彻头彻尾是极可笑的。

辩护律师擦了擦自己的眼镜。

“听我说，年轻的朋友，”他说，“有没有罪倒不打紧，要紧的是策略。在我们的法庭上假装无罪，说得宽厚一点，也是太轻率了。恰好相反，最精明的办法是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有罪。例如，商人最好是挑选欺诈的罪名。在审讯过程中也许往往发现被告的话有些夸张，其实他并没有犯什么真正的欺诈罪，不过是，比方说，按照生意场中的惯例，对某几件事秘而不宣罢了。从犯罪到宣告无罪的道路是艰苦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要保持清白却真是妄想，结果反而弄得身败名裂。你本来可以赢的，却输掉了；而且，用了你这个办法，你就不免落得没法再来挑选你的罪名了；你只好听任别人定你的罪。”

推销员觉得好笑，耸了耸肩膀。他说，他不能遵命，非常抱歉：哪怕是一件他曾经犯过的跟法律相抵触的罪行，他也想不起来。

辩护律师重新挂上他的夹鼻眼镜。他知道他跟特雷普斯将要纠缠不清了；这不会是一桩轻松的事儿。他只好这样结束他们的谈话：“最要紧的是，讲话要字字推敲；千万别东扯西拉地乱说，否则你一下子给判了好多年徒刑，自己还莫名其妙，而且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他的客人也进来了。他们围着圆桌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彼此开着玩笑。起初端上来的是各色各样的小碟佐肴，冻肉片、俄式煎蛋、牡蛎，接着上的是甲鱼汤。大家都兴高采烈；他们满意地用匙子舀着汤，毫无拘束地吃着。

“喂，被告，你提出来的是什么案子？”检察官哑着嗓子叫道；“一件了不起的大谋杀案吧，我想是。”

辩护律师反驳道：“我的诉讼委托人是个没犯过罪的被告——看来是一件司法界的奇闻。他一口咬定他没有罪。”

“没有罪？”检察官骇异地叫喊道。他脸上在决斗时留下的疤痕涨红了，单眼镜从眼睛上滑脱下来，差点儿落到他的盘子里，它吊在那根黑绳子下面，前后摆动着。

那个矮小的法官，正在把面包掰碎放进汤里去，他停了一下，向特雷普斯投了个责难的眼色，严肃地摇了摇头。那个身上插着白石竹花的、沉默寡言的秃顶老头，也愕然地盯着他瞧。

突如其来的寂静有些吓人。连叉子或羹匙的叮玲声都听不到，也没有一声粗重的呼吸或一口一口呷汤的声音；只听见西蒙小姐在房间后面吃吃地窃笑。

后来检察官恢复常心了。“我们得研究研究，”他说；“不可能的事儿，是不会存在的。”

“尽管问吧，”特雷普斯笑着说，“随你们把我怎么办好了。”

吃鱼的时候，酒也送上来了——一种较淡的、起泡沫的纳沙泰尔酒。

“那么，”检察官一边切着鲱鱼一边说，“让我们想想。结过婚吗？”

“十一年啦。”

“孩子呢？”

“四个。”

“什么职业？”

“纺织业。”

“啊，那么你是一位推销员罗，我亲爱的特雷普斯先生？”

“营业部主任。”

“好极了。你的车子抛锚了？”

“真倒霉。一年里头一回。”

“啊哈。一年以前呢？”

“哦，那时节我还开我的旧车，”特雷普斯解释道，“一辆一九三九年的雪铁龙。可是现在我有了一辆斯托得倍克——红色的——特别讲究的汽车。”

“一辆美国汽车，嗯？哼，哼，真有意思。最近才弄到手的罗，依我看？我猜想你从前并不是当营业部主任的吧？”

“不是，以前不过是个平常的、普通的纺织业推销员。”

检察官点点头。“交了好运啦，嗯？”

辩护律师坐在特雷普斯旁边。他悄悄地说：“当心点。”

但是那位推销员，或者不如说像现在我们所称呼的营业部主任，毫不在乎地开始调拌他的牛排酱。他有他自己的调制法：几滴柠檬汁，掺上少量的白兰地、辣椒粉和盐。他愉快地宣称，他真还没有吃过比这更美好的菜肴。他一向以为“乌托邦俱乐部”的集会必定是他这种人所能想望到的最有趣的娱乐，可是那些集会跟今晚上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

“啊，”检察官说道：“那么，你是‘乌托邦俱乐部’的会员罗。请问在俱乐部里他们给你取了个什么绰号呢？”

“卡泽诺瓦

“妙极了！”检察官欢呼起来，仿佛这是个顶顶重要的信息，他把单眼镜拿起来夹好。“听到这个绰号，我们都很高兴。我亲爱的特雷普斯先生，这个绰号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在你的私生活方面得出什么结论呢？”

“小心啦。”辩护律师又低声说。

“有限得很，我亲爱的先生，有限得很。”特雷普斯回答道，“要是我确实有过什么婚姻以外的艳遇，那纯粹是偶然的。机会。我并不是有意干的。”

法官又给客人们的杯子斟满了纳沙泰尔酒，他自己也趁这个机会提出一个问题：特雷普斯先生可不可以给大家扼要地谈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呢？既然他们决定要审判他们亲爱的客人和讨人欢喜的恶棍，也许还要判处他多少年徒刑，那么他们就理当知道一些他个人生活方面更隐秘的细节。当然，跟女人谈情说爱的事儿也许正好是对题的，请他不惜添盐加酱地谈谈。

卡泽诺瓦 (1725—1798)，意大利的冒险家，著有《回忆录》一书，其中记载了他的种种放荡行为。

“讲给我们听听，讲给我们听听！”老头儿们齐声笑着说。不过，他们又告诉他，他们曾经款待过一个拉皮条的人，那个人给他们讲了许许多多关于他那行业的最叫人肉麻的轶事——尽管如此，他们只判了他四年劳役。

“哈哈，”特雷普斯随声附和地笑了，“我可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事儿可谈。我过的是很平淡的生活，先生们——甚至可以说，我的生活跟随便哪个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干杯！”

“干杯！”

营业部主任举起了酒杯，他必恭必敬地面对那四个老头儿炯炯的目光，他们正眼瞪瞪地瞅着他，好像他是一片特别鲜美的肥肉。接着他们彼此碰杯。

窗外，太阳落下了，鸟儿的吱喳声渐渐稀疏。可是郊野里还覆蔽着日光——近处，绿树丛中点缀着村子里的一些红屋顶；稍远一点，是树木繁茂的山冈；而在远方，却是崇山峻岭，山上的冰河仍反射着一道道阳光：一幅幸福、天赐的恩惠和宇宙的和谐全景，沉浸在温馨的安宁和田园的谧静的气氛中。

西蒙小姐把他们的盘子撤下去，端上一大碗热腾腾的奶油炖蘑菇的时候，特雷普斯开始谈他的身世。

他的青年时代是在艰苦的搏斗中度过的。父亲是个工厂里的工人——受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影响的无产者：一个受尽辛苦、毫无快乐的人，对自己的独生子从来也不关心。他母亲是个洗衣妇，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

“除了小学我没再上过什么学校。”他眼眶里噙着泪水，他有感于自己时乖命蹇，悲哀和深切的感伤交互地撕裂着他的心，“除了小学没再上过什么学校。”